

傅著「丁文江與中國科學和新文化」

張朋園

原 書·· Ting Wen-chiang: Science and China's New Culture. 237 pp. Appendix, Abbreviations.
Notes, Bibliography, Glossary, Index

著 者·· Charlotte Furth

出 版 者··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, Cambridge, Mass., 1970

定 價·· 美金十元

中國近代史上有一些人是為科學運動而死的，丁文江是其中之一。丁文江在知識分子圈子中，知道的人不算少，但在一般人的腦子裏，他是一個陌生人。他死後二十年，胡適為他寫了一本十二萬字的傳記，（「丁文江的傳記」，中央研究院院刊，第三輯，民國四十五年）第一次將他的地位提高了。現在，傅樂詩（Charlotte Furth）的新著「丁文江與中國科學和新文化」，再次有所評估。他們認為丁文江是「賽先生」的大力提倡者，身體力行，尤其對於地質學及中國人的科學觀念有極大的貢獻。他同時是一位愛國主義者，想以「少數人的責任」自任，在政治上有所做為。這兩本書對丁氏的刻畫，皆屬入木三分，丁文江可以不朽矣！（註一）

我無意將胡適的「丁文江的傳記」與傅樂詩的「丁文江與中國的科學和新文化」合而評論，但我必須指出前者有開山作用；而且一個提倡科學的領袖為另一個服膺科學而死去的朋友作傳，雖難免帶有隱約的感情與懷念，究竟在「有七分證據不說八分話」的原則下所寫的東西，後人是容易超過的。可喜的是傅樂詩之著作正好有優異的表現，雖然她不得不循着胡適給她鋪好了的路子。正因為如此，她才有進一步的分析與解釋。

傅著全書共分九章，除了頭尾的緒論與結論外，前四章論丁文江的科學生涯，後三章述其政治信仰與活動。她在緒論中說，

清末民初是中國的轉型期，出身傳統士紳家庭的子弟，有較多的機會到國外去留學，學一套新的東西回來。但他們受舊傳統的影響在先，新舊參和，大多以漸進的態度求取中國的改革；梁啟超在清末提倡「新民」，民國初年的知識分子則高喊「新文化」，都是漸進的。激進的思想要在民國十年以後才高漲起來。他認為丁文江的溫和性格與此背景有關。

丁氏於十七歲（一九〇四）赴英國留學，在英國七年，他讀過一年英國的中學，進入大學之後，他一度想學醫，最後以地質學及動物學為主科畢業於格拉斯哥大學。傳著的第二章就寫了丁文江的留學情形，指出他在留學時期受流行一時的生物進化論影響甚深，達爾文（Charles Darwin）、赫胥黎（Thomas Huxley）、皮爾遜（Karl Pearson）等啓發了他的智慧。最基本的，丁氏學到了科學的方法，這是他準備建設祖國科學的武器。第三章述了丁文江於二十四歲（一九一一年）歸國，從雲南入境，立即從事地質調查，日後任地質調查所所長，從事地質、礦冶、人類學、考古學等方面的綜合工作。著者形容丁文江像遠征歸來的奧德賽（Odyssey）一樣，其重整家園的志氣是十分高昂的。第四章以「新文化與中國傳統」為標題，指出五四時期的思潮只解放了年輕的一代，並未真正對西方的制度有所分析，也沒有發為社會行動。「新」字是大家的口頭禪，什麼是西方的新模式，蓋一無辨認。「德先生」趨重於自我的表現，而非對家庭的負責，只有烏託邦的一面。科學與理性亦不過要求反市儈、反迷信、反權力而已。科學家丁文江則不喊口號。他切切實實地提出革新之道。他在進化論的影響下，提倡優生學。他的「哲嗣學與譜牒」是一篇重要的優生學論文。破壞偶像主義並不顯示一切都該打倒。國故中也有精粹的一面。宋應星著《天工開物》，徐霞客發現了長江的源頭。他們是中國的科學家，丁文江或發掘他們，或表揚他們。第五章討論了丁氏與張嘉森的「科學與人生觀」之爭。什麼是科學，丁文江對科學的認識如何，這一章發揮到了頂點。

第六章開始討論丁文江的政治見解與活動。他的最早的政治理想見諸於努力週報（一九二二—二三），當時軍閥橫行，國家混亂。丁文江認為這是因為優秀分子沒有盡到責任的關係。他提出「少數人的責任」一語，要求知識分子來改變這一個局面。如果少數優秀分子負起了責任，則國家必可及時救得過來。因此他與一般注意時政的朋友提倡「好人政治」，此已伏下了民國二十五年丁氏短暫從政的動因。第七章接着寫了丁文江任上海商務總辦（市長）的經驗與作為。第八章再談了丁氏的政治理想，民國二

十年以後，他在獨立評論（一九三二—一九三五）中的政治見解是極端的，他受蘇俄及德國的影響，主張獨裁。第九章，著者以丁文江爲理性主義者而作成結論。以上是本書的全貌。

值得推重的是著者的架構。全書以科學家、進化論者、溫和的理性主義者等幾個觀念來控制全部的討論，脈絡是清楚的，見解是引人的。最成功的部份，是論丁文江受西方科學的影響及其溫和的愛國性格。丁文江信仰科學，究竟對科學的認識如何？什麼人對他有影響？影響他的人對科學的認識又如何？這些問題我們都獲得了回答。著者指出丁文江留學英國七年，受達爾文、赫胥黎、皮爾遜等的影響甚深，他們不僅啓發了丁文江的科學思想和科學方法，同時又影響了丁氏成爲一個進化論者。中國因嚴復及梁啓超等之介紹天演學說於中國，進化論在清末民初盛行一時，但當時人所了解的社會進化論，是影響帝國主義猖獗的「弱肉強食」說。丁文江所接受的達爾文主義，是科學的進化論，是觀察生物自然界的科學方法。

進化論影響遺傳學，葛魯東 (Francis Galton) 運用天擇的原理於文明人種的研究，他認爲人類的社會習慣是會遺傳的，乃至於人的性格，智慧，健康狀態都會遺傳。葛魯東以統計的方法去觀察，果然有非常的發現。丁文江在英國留學，正是遺傳學獲得熱烈討論的時候，因此他亦接受了此一學說。回國之後撰「哲嗣學與譜牒」一文，強調優生學，倡言只有優秀的高等人才有資格談多兒多女。中國的人口太多，應該講求優生學，節制生育。中國的人口問題，丁文江早就看清了。

丁文江提倡科學，所提倡的是科學方法。他與張嘉森辯論，所辯的也是科學方法，他強調實驗與歸納。他的科學認識論受皮爾遜的影響。皮爾遜是實證主義者，一向反對歐洲大陸的唯心論，視唯心爲科學進步的障礙。但皮爾遜打破唯心唯物二元論的企圖，科學派亦認爲其說不科學。丁文江以存疑的唯心論 (Skeptical idealism) 爲科學的認識論，犯了與皮爾遜同樣的毛病，有似是而非之嫌。所謂科學，不僅是方法的問題，理論也很重要。談到理論，就很難說其爲唯心或唯物了。

著者討論科學與人生觀之爭，同時亦說到了張嘉森的文學。她指出張氏受唯心派哲學家倭伊鑑 (Rudolf Eucken) 及柏格森 (Henri Bergson) 的影響，對倭氏的生命力論，柏氏的生命衝進論 (Vitalism) 都有所申述。張嘉森因爲受他們的影響，所以才回頭來提倡陸王心學。

著者對丁文江的又一論點，是他的溫和性格及理性主義。她在本書的序文中，謂出身士紳家庭背景者趨向溫和，似乎已確定了丁文江的性格，再加上服膺達爾文主義，故丁氏走向漸進是一定的。

五四以後，中國的若干知識分子猛烈地批評傳統文化，破壞傳統文化，中國固有的一切幾乎分文不值。丁文江不得不站出來為中國的傳統文化說話，他認為中國文化並不是孤立的。中國自古代以至於近代，不斷地自不同的方向接受外來的文明，過去如此，今日當然也能接受西來的工業化。接受外來的文化並無排除固有文化的必要。新舊自會融合一體，成為中國自己的文化。他的這一看法，是受進化論的影響。

丁文江講求優生學，他主張上等人統治下等人。他似乎覺得傳統的科舉制度有其長處，士紳是合法的統治者。他雖然相信進化論，同時又保存了若干傳統的儒家思想，他認為兄友弟恭，濟弱扶傾是很好的美德。他有中堅階級的想法；社會進步要靠中堅分子來推動。丁文江是一個理性主義者。

一本書有其長處，難免也有令人不能完全滿意的地方。對於丁文江的從政生活，為什麼他要與孫傳芳合作？著者有四點解釋：(1)這是「好人政治」的付諸實驗；(2)軍人也有好的，理當扶助他們；(3)五卅慘案發生了，參與協調，用和平的方式解除列強在華的特權；(4)聯孫傳芳反張作霖。這幾點理由都沒有疑問。但丁文江與孫傳芳的關係如何？他們是怎樣認識的？如果他與孫傳芳沒有淵源，孫怎能將上海市長這樣一個重要的位置交給了他？著者根據胡適的「丁文江的傳記」中所說的理由固然不錯，但胡適的說法也不能令人滿意。

丁文江與孫傳芳合作的問題，我有一個自己的看法。我很同意周策縱在五四運動一書中將民國初年派系分而為四的論點。這四大派系：第一是自由派，如胡適、蔡元培、吳稚暉、高一涵、陶孟和、蔣孟麟、陶行知等；第二為左傾的激進派，也就是後日的共產黨；第三為國民黨，又分為激進與溫和兩派；第四為進步黨，又分為保守與自由兩派。(註二) 丁文江在民國七年以後與梁啟超（進步黨的自由派）、胡適等往還，無疑的屬於自由派。雖然自由派沒有很堅強的有形組織，梁啟超一派仍然是有影響力的。丁文江、胡適等都尊敬梁氏為老輩，梁的弟子蔣方震、張嘉森等則為丁、胡的朋友。這一批頂而尖的知識分子，民國十二年

以後對於省憲運動有很大的興趣。他們認為中央在軍閥的把持下搞不好，不如從地方做起；選幾個據點，希望有普魯士的出現，成爲中國統一的力量。他們與國民黨沒有淵源，而且互相仇視，沒有與國民黨合作的理由。他們選擇孫傳芳，固然孫在北洋中算是「好人」，關鍵恐怕還在蔣方震。蔣與孫傳芳是日本士官的先後同學，丁文江經蔣的介紹而與孫傳芳認識，或進一步的認識。孫傳芳原想拉蔣方震來幫助自己。但蔣在十五年夏天之前的目標在聯吳佩孚伐張作霖，所以把丁文江薦給孫。

著者和胡適都認爲丁文江對國民黨同情。恐怕事實正好相反。當時人謂北伐軍爲赤軍，丁文江與梁啓超等人都是反對共產主義的，怎麼會去同情北伐軍？北伐軍打敗了孫傳芳，丁文江沒有去處，只好逃往大連，是一明證。有謂蔣方震與北伐軍有聯絡，蔣的學生劉文島是牽線人。但據初步的了解，劉文島所聯的是唐生智，而唐與北伐軍的統帥蔣總司令之間是有着距離的。總而言之，梁啓超、胡適等自由派，既不與國民黨聯繫，更不與共產黨有關，這時他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。著者在處理丁文江與孫傳芳的問題時，沒有加重蔣方震的份量。換而言之，著者沒有注意到國民黨、共產黨、北洋派以外的一羣知識分子，他們隱然也是一個勢力，也是時局發展的左右者。

著者在這一方面的缺點，顯然是受了史料的限制。西方人治中國歷史，如何擴大應用的史料範圍是他們最弱的一環。（中國人的名字亦使西方史家困惑，名與字易於混亂。傳著有誤字爲名者，如龍研仙應爲龍璋，梅月涵應爲梅貽琦，任叔永應爲任鴻雋等然。）

讀完了傳著，我有一個感想：中國學者治中國史，涉及到西方的人及其思想時，應該進一步去追究；西方學者治中國史，應該擴大視野，對有關的背景多所了解。

附 註

註一 郭穎頤著「中國廿世紀科學思想史」對丁文江亦有專章討論（見 D. W. Y. Kwok, *Scientism in Chinese Thought 1900-1950*, (New Haven, Yale Press, 1965)

註二 Chow Tse-tsung, *The May Fourth Movement*, (Stanford, Stanford Press, 1960) p. 215-217.

傳著「丁文江與中國科學和新文化」